

从八个方面总结了历史经验。2018年，他又用九个方面的“必须坚持”对改革开放40年来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总结。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他围绕“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总结了九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实际上，习近平在长征胜利80周年、建军90周年、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抗美援朝70周年等重要节点，均从不同角度对党的历史经验作出系统总结。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所总结的十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在习近平的上述讲话中大多都有过不同程度的论述。换言之，决议对十个方面历史经验的总结，实际上是对习近平有关论述的再梳理、再阐释、再重申。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如此重视历史经验总结，党史研究者更应拿出高学术含量的史与论真正融为一体的研究成果，助力于治国理政，可谓时代重任。党的历史经验和党的探索、奋斗交织、融合在一起，显示这些经验既具有一以贯之的灵魂和主线，又有一个萌生、形成和丰富、调整的过程，要历史地具体地理解和对待。主流党史研究有责任让历史经验总结既高屋建瓴、富有哲学理论又史料丰富、富有历史纵深，真正达到史论融为一体，既引人深思又引人入胜。

史论结合的传统不能丢，但要打造“升级版”，就必须正视问题的存在。其一，论从史出不能建立在以偏概全的史实基础上。“论”必须建立在“信史”“全史”的基础上，没有准确而全面的史实基础，“论”再多也无说服力。论从史出的“史”，必须是经得住各种史料验证、经得住不同角度观察的“信史”，然后才是解释和分析。结论先行，甚至故意遮蔽人所熟知的历史面相，再正确的“论”最终也立不住，并戕害史论结合的传统。其二，“论”不能过于宏大、机械。史论结合的理想状态是有机融为一体，论在史中，要言不烦，画龙点睛，甚至“大象无形”，隐于字里行间。历史过程叙述告一段落后，再来一节单独的理论思考，有的时候必要，但多数情况下令人感到机械甚至画蛇添足。此外，历史哲思、经验总结中的结论不能过于宏大、平泛。如果所谓理论或经验总结，既可以放在这个历史问题上，也可以放在另一个问题上，那么这就不是真正的历史哲思，问题域的“适配度”才是检验历史哲思程度或者史论结合质量的重要标准。在新时代，打造史论结合的“创新版”势在必行，这是衡量传统党史研究水准和生命力的重要标尺。

《中共党史研究》作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主办的刊物，学界期望它在引领党史研究方面发挥旗帜作用，起到学术引领和风向标作用，多登载一些用学术讲政治、反映新时代主流党史研究特色的文章，有意识地组织和登载反映传统党史研究创新性发展的作品，鼓励运用新理论新方法研究传统党史学中的老问题，鼓励传统党史学开辟研究新领域，打造“升级版”的学术成果。《中共党史研究》近些年来也在这样做，希望日后进一步加大力度，进一步增强引领意识，让传统党史研究在建党百年之际“风华正茂”。

（本文作者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研究员）

作为一级学科的中共党史与世界史的对话

梁 志

中共党史学科萌芽于延安整风时期，主要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及其发展规律。在学科归属上，中共党史长期被划归法学门类政治学一级学科下面的二级学科（或专业），名称先后有“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党的建设与中共党史”等。学科目录经过几次修订和更新，一级学科的地位不断凸显，二级学科的作用渐趋下降，“化实为虚”，日益向学术研究方向和人才培养

养领域过渡。^①在此情况下，中共党史学科一度被边缘化，呈现萎缩态势，引起了很多相关学者的高度关注。或许正因如此，在2021年底公布的《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中，作为国家急需学科，“中共党史党建”有望升级为法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

提升为一级学科，就使得学界构建“大党史”格局具有了更大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所谓“大党史”，即胡乔木所言：写中共党史“并不是眼睛只看着自己，就像照镜子，只看到自己，而是左顾右盼”，“我们搞党史视野要放宽一点，要从四面八方来反映”^②。这里的“四面八方”，大体上可以理解为研究中共党史应将视野放宽至20世纪以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宏大历史进程，不仅仅要关注政治和军事方面，还要考察经济、社会、教育、思想、文化、科技、生态和外交等诸多领域。看似边界清晰实则广袤无垠的“领地”，使中共党史研究成为一门综合学科，具有显著的跨学科特性，需要充分利用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相关学科提供的概念、方法和视角等学术资源^③。

早在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提出，研究党的历史需要遵循“古今中外法”。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④同样，龚育之也认为，从事中共党史研究要做到“观察国内与观察世界的统一”，原因是“国际局势与国内发展密切相关，特别是到了近现代，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都离不开世界”^⑤。易言之，中共党史与世界史密切相关。

同样作为一级学科，世界史的研究对象“涵盖了人类以往的全部历史”，“在时间上，涵盖了人类自产生直到现在；在空间上，覆盖了世界上所有的地区”^⑥。由是观之，在研究对象上，世界史学科与中共党史学科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但就学科性质来说，与世界史相比，中共党史具有更强的政治性、理论性和现实性，更加强调鉴古知今、资政育人的功能。正因如此，学术界可以将中共党史与世界史视为能够平等对话的两个亲缘学科。这种对话的形式之一便是中共党史研究吸收世界史研究各种理路或范式中的有益养分，有机融入自身的学术追求。

20世纪50年代以来，部分地出于对由来已久的民族国家史学和“欧洲中心论”“西方中心论”的反抗，全球史和跨国史研究两股学术潮流相继兴起，很快被国际史学界广泛接受。显然，全球史和跨国史研究“有意”弱化民族国家在以往历史书写中的绝对强势地位，这与中共党史研究先天的“中国中心”诉求格格不入的。但全球史和跨国史研究者所推崇的核心概念——“联系”（connection）（世界横向互动）^⑦，对中共党史研究具有明显的提示作用。中共党史研究以往更加注重考察中共自身及其政策的历时性变化，而较少将中共历史置于全球、地区、国家间互动关系网络中讨论共时性关联。事实上，从十月革命到日本侵华战争，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东西方冷战，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不断取得的重要成就和历次遭遇的严重挫折，几乎都与国际环境变化密切相关。反过来，中共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也成为塑造20世纪世界历史的最重要力量之一。从这个角度讲，从事党史研究的学者不仅仅要从纵向上观察中国共产党的成长，还要有意识地在中国与世界互动的视

① 马怀德、王志永：《我国学科目录的历史沿革、功能审视与优化路径》，《大学与学科》2021年第1期。

②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15、343页。

③ 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综合性学科属性的最新讨论，参见吴志军：《无妨以更广阔的胸怀来认识党史研究的学科属性——兼论学术观念的自我反思意识》，《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1期。

④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00页。

⑤ 龚育之：《理论·党性·方法——关于建国以来党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特区理论与实践》1999年第7期。

⑥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一级学科简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60、64页。

⑦ Roland Wenzlhuemer, *Doing Global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in 6 Concepts*,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9, p. 3; Franz L. Fillafer, “A World Connecting?: From the Unity of History to Global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Vol. 56, No. 1 (March 2017), pp. 3–37.

野下从横向上体认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国际影响，做到“内外兼修”，继而搭建起“世界—中国（中央—地方—民众）”的“大党史”书写框架^①。与此同时，无论是全球史研究还是跨国史研究，均倡导比较方法^②。同理，中共党史研究也不能“只看到自己”，而要“左顾右盼”，通过横向比对，在20世纪各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发现“中国特色”，在人类文明进步的总体图景下找到中国过去所处的方位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如果说全球史和跨国史研究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向外”的路径，那么“新文化史”和“新社会史”等研究理念则推动中共党史研究的视角逐步“向下”。大约从20世纪60年代起，世界史学出现转向，其中的重要标志便是“新文化史”和“新社会史”的发轫与勃兴，这是一次对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和外交史宏大叙事的反动，视线由精英人物下移到“没有历史”的底层民众，由国家史下移到地方史。这与中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书写“人民的历史”等观念异曲同工，也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普通人和基层社会一定程度上所具有的主动性和首倡精神高度契合，值得中共党史研究者借鉴。当然，“新文化史”和“新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共党史研究并非要刻意弱化传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研究，而恰恰是为了重返历史现场，从更为多元的视角观察中央、地方、民众三者间的复杂联系、互动与碰撞，揭示三者在不同时期、不同层面和不同程度上表现出来的主体性。唯其如此，才能实现宏观历史与微观历史书写的统一（过分强调前者会带来“空洞化”，过分强调后者则将导致“碎片化”），更为立体地展现中国共产党这个百年大党的历史脉络，更好地体现中共党史研究的“空间感”及蕴含于其中的人文精神。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强调档案资料运用、追求“如实直书”的兰克史学影响下，历史学的专业化程度明显提高，独立的学科地位逐步确立。此后，重视一手史料的利用成为历史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特征之一。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国家间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美国外交史学界出现了推动“国际史”研究的呼声，核心要义是外交史研究应利用多国档案，关注美国与其他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实现“去国家化”^③。同样，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美国著名冷战史专家约翰·加迪斯大力倡导开展“冷战史新研究”，即在冷战结束赋予研究者的全新时空框架内，利用多国多边档案，挣脱“美国中心论”的羁绊，重点关注“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并重新解说意识形态在冷战中发挥的作用^④。世界史研究特别是外交史研究在史料学方面的相关主张给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中共党史研究进一步提高科学化和规范化水平的有效路径之一就是注重原始文献的发掘和利用。这里所说的“原始文献”，首先指中央和地方各档案馆以及相关企事业单位和个人收藏的档案资料。但可资利用的一手史料并不止于此。除极个别时期外，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便不断扩大对外交往，因此世界上的相当一部分国家和国际组织甚至大型（跨国）企业和知名大学所收藏的档案均包含一定数量的相关史料。换言之，在语言能力可以支撑的情况下，党史研究未来完全有条件也有必要使用多边档案文献，在中外史料相互补充、彼此印证的基础上，从国内外诸因素互动的层面综合考察中共建立和发展的历史过程。

实际上，胡乔木、胡绳等老一辈党史专家很早便形成了一个共识，亦即深入研究党的历史的前

① 在这方面，已有学者作出堪称典范的研究，如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山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沈志华：《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② 刘新成：《从国家交织中寻找“全球”：越界的全球史》，《世界历史评论》2019年第4期；Bernhard Struck, Kate Ferris and Jacques Revel, “Introduction: Space and Scale in Transnational History,”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Vol.33, No. 4 (December 2011), p.573.

③ Akira Iriy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94, Issue 1 (February 1989), p.4; Michael Hunt, “Internationalizing U.S. Diplomatic History: A Practical Agenda,” *Diplomatic History*, Vol.15, No.1 (Winter 1991), p.1.

④ 陈兼、余伟民：《“冷战史新研究”：源起、学术特征及其批判》，《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

提之一就是联系中共对外交问题的处理^①。在当下构建“大党史”格局的背景下，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或学术生长点，这一研究领域恰好也是中共党史研究与世界史研究的接榫处。近年来，华东师范大学、武汉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和厦门大学等高校的一批从事世界史研究特别是冷战史研究的学者“跨界”关注当代中国外交史，成为推动中共党史研究的一支“外部力量”。过去，他们眼光向外，重点致力于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利用的史料也多为外国档案。因此，这些研究者习惯性地当代中国外交置于更为广阔的国际环境下加以考察，注重挖掘对象国的档案资料，在此基础上从双边互动甚至多边联动的视角诠释中国对外政策制定、执行与调整的动因和影响，进而令中共党史研究具有了某种“世界史”的意味。

作为中共党史研究领域旗舰期刊的《中共党史研究》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不断推动 21 世纪以来的中共党史研究与世界史研究的实质性对话。根据笔者的粗略统计，《中共党史研究》自 2001 年至 2020 年所刊发的有关当代中国外交史的文章数量约为 215 篇，约占这 20 年间期刊总刊发文章数的 8.6%。纵观近 20 年发表论著绝对数量的变化，2010 年迎来了第一个高峰，这一年共发表了 20 篇，之后到 2018 年迎来第二个高峰，共计发表 23 篇。就发文量而言，这在同类或相近学科的期刊中应该是首屈一指的。从研究主题来看，这些文章不仅仅限于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等大国，更涉及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蒙古等党史研究者过去几乎没有涉足的周边国家。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党史研究》还有意识地从学科建设（“形而上”）和资料建设（“形而下”）两个方面推动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为了及时更新乃至重构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哲学基础、学术理念和研究路径，编辑部和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周边国家研究院于 2018 年 5 月联合举办“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现状与未来”座谈会^②。随后，《中共党史研究》还开设“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现状与未来”笔谈专栏，至今已刊发两期，论题广泛涉及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范畴、主题、理论、书写范式以及“跨国史”和“国际史”所主张的多国多边档案互证研究方法等。与此同时，《中共党史研究》还十分重视海外中共党史资料发掘工作，相关栏目有“海外来鸿”“文献·资料”“国外中共党史资料”等。尤其是近五年来，该刊集中刊发了一批介绍俄罗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韩国乃至缅甸、印度尼西亚和蒙古等国家档案收藏机构涉华档案资料的评介类文章，不仅为从事中共党史研究的学者提供了珍贵的海外文献信息，而且发挥了方法论指引的作用，引导相关学者认识到海外中共党史资料的重要价值和中外资料互证的必要性。

一言以蔽之，在即将升级为一级学科之前的一段时间里，中共党史研究已然在范式、方法和视角等方面对世界史研究有所借鉴。但毋庸讳言，当下的中共党史研究在某些层面上还处于“失衡”的状态：其一，党史研究理应以中国共产党为中心，但这并不妨碍在与“他者”比较的过程中重新审视“自我”，否则在某些情况下会导致认为那些“习以为常”的思想、制度、进程和现象理所当然；其二，中国共产党走过的百年历程包括诸如建党、改革开放等很多重大历史时刻、事件和决策，若要深入理解这些重大议题，需要打破内政和外交的“天然”区隔以及惯性思维的阻遏，对相关的国内外因素予以综合考察；其三，越来越多的党史研究者将观察的视线下沉到地方和民众，但其中部分研究因此失去了对“整体史”的把握，多少呈现“碎片化”的状态；其四，在一手史料运用上，针对同一类外交史研究课题，从事党史研究的学者偏重于使用中方档案，而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学者偏重于使用外国档案，其中单就国外档案挖掘本身而言，大国和周边国家的档案逐步得到了运用，而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相关原始文献还几乎处在无人问津的状态。

^① 章百家：《从党史和外交史看国际问题的处理》，《俄罗斯研究》2021 年第 3 期。

^② 梁志：《“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现状与未来”学术座谈会综述》，《中共党史研究》2018 年第 5 期。

承上所论，在中共党史研究即将迎来一个新的发展起点的情势下，从各个层面加深与世界史学科的对话更显必要。中共党史研究的综合性学科属性决定了它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经过长时间的磨合，如今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学者已深度融入党史研究，成为党史研究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越来越多的世界史研究者特别是中青年学者借由当代中国外交史的门径“闯入”党史研究领域，未来有望被接纳为党史研究界的“编内人士”，从而成就党史研究实现历史学化过程中的又一次跃升。但相对与中国史的深度交融，党史与世界史的融合还处于初级阶段，大体上停留在“以文会友”的层面。未来，党史研究者需要更多地采用国际视角，世界史研究者则应有意识地增强本土关怀。只有这样，二者才有可能彻底打破学科界限的隔阂，进行真正的跨学科对话，最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

在现代学术体系中，对每一个学科来说，学术刊物都是重要的交流平台，中共党史研究自不例外。期刊的作用不仅仅在于刊发学术作品，更在于学术引领和组织。根据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的分类，《中共党史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党的文献》等党史类期刊均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类。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目录（2021—2022）中，此类期刊大约20种，数量十分有限。在此种情况下，建设包含“古今中外”的“大党史”学科的任务便显得尤为艰巨。其一，即使十分困难，相关刊物仍应尽可能将整个20世纪历史纳入观察范围，兼顾内政与外交，同时关注中央、地方和民众，注重国外党史新资料的发掘。其二，有关刊物可考虑通过召开学术会议、组织笔谈、发表访谈录等方式推动中共党史与世界史两个一级学科的对话，从跨学科的角度加强党史学科的建设。其三，中共党史类期刊可以考虑扩大同《近代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甚至《世界历史》《冷战国际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等刊物的合作，共同构建“大党史”期刊群，强化彼此之间的分工，从不同的时间、空间和侧面反映党的历史。

在党史研究中有有机融入世界史研究元素的最根本途径恐怕还在于人才培养。目前，全国设立党史本科专业的高校屈指可数。在中共党史成为一级学科后，应该陆续会有更多的高校设立党史本科专业，党史人才培养将迎来新的机遇。在此过程中，不仅仅要加强党史专业课程的建设，也要适当纳入世界史课程，特别是外国史学史和研究方法类课程，实施跨学科培养。与此同时，还应强化外语能力训练，为他们将来综合利用海内外党史资料奠定语言基础。反过来，还可以在历史学人才培养中努力实现中国史和世界史两个一级学科的交叉融合，尤其是20世纪中国史与世界史的融会贯通，从而间接为未来的党史研究储备一批有生力量。

毛泽东曾言：“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①确实如此，中共党史研究应借鉴世界史研究范式，但这种借鉴绝非“生吞活剥”的理论横移，而是在批判性吸收后努力实现范式迁升。同样，在具体的研究实践过程中，研究者应始终将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作为主体和出发点，以此为基础和前提，力争实现四个“平衡”：“自我”和“他者”的平衡认知、影响党的历史的内外部因素的平衡考察、微观史和宏观史的平衡书写、国内外资料的平衡利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葛君老师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提供了很多帮助，谨致谢意）

（本文作者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教授）
（责任编辑 吴志军）

^① 《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07页。